

宋、明、清对黄河上游的军事布防

姜勇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黄河上游番地民族众多,环境复杂,宋明清三朝在此均布有重兵,但由于力量对比、地理形势及对此地区的控制力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布防特点:如北宋时期的纵深防御、明朝的线性防御以及清朝在枢纽重镇的驻兵。此地的军事形势虽不足以构成各朝的心腹之疾,但仍是长期牵扯各朝国力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黄河上游;番地;军事布防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4)03-0046-07

Defence Deployment Upstream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 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a lot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upstream the Yellow River. All of the three dynasties, Song Ming and Qing, deployed massive forces in this area owing to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Their defence organization presen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various balance of powers, geographical situations and controlling abilities to that region. The Song dynasty took the concept of defense in depth other than the linear defense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 Qing dynasty preferred to deploy the army in the military centers. The military situation at upstream of the Yellow River will sap the national power of the three dynasties, though not their mortal malady.

Key words: upstream of the Yellow River; minority areas; defence organization

黄河上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原大地、蒙古草原、雪域高原和西域新疆几个地区之间的连接地带,农、牧民族在此角逐进退。历代中原政权将此视为边陲要地,北方游牧民族也常以之为南窥中原的绝好跳板。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自古及今,历朝历代无不在此地区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唐代以后,中国的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这一地区在此后宋、明、清各朝政治军事中的地位是否因此而消减,军事的布防有哪些调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黄河发源自青海省玉树,经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九省区,汇入大海。自河源到内蒙古河口镇,是为黄河上游。具体说来,黄河上游地区主要包括青海省的青南和河

收稿日期:2013-11-03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课题“武将家族与两宋政治”(13JDS02YB)

作者简介:姜勇,男,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源地区,河曲和共和盆地,西海和湟中地区等,甘肃省的河洮和岷州地区,兰州和白银地区,河西走廊和景泰地区,秦州和巩昌地区以及宁夏、内蒙古的六盘山、清水河和河套平原^[1]。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河西走廊的大部分、祁连山脉等地区,虽然在地理划分上并不完全属于黄河流域,但在历史上,却与黄河上游地区息息相关,拥有共同的发展历史,在汉唐至明清等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经略中,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青海、甘肃与宁夏三省全部,统称为黄河上游地区。这一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型气候,草场、绿洲、山地,以及黄土高原错落分布,属于农牧交错地带^[2]。在历史上,黄河上游地区也是从事游牧、农耕及半农半牧的各个民族居住生息的家园。

一、宋代:以堡寨的设置为中心的纵深防御

由于南宋仅与黄河上游吐蕃接壤,且军事交往不多。故本文对宋代的军事布防的研究仅限于北宋时期。而此时,黄河上游地区主要为吐蕃和党项羌建立的西夏所占据,北宋与其交界的区域为陕西路(或永兴军路、秦凤路)和麟、府二州。吐蕃诸部,前期为北宋拉拢的对象,后期为熙河拓边的主要区域,对北宋威胁不大。而西夏常常派兵侵扰宋境,宋夏之间曾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北宋的军事布防也因此主要针对西夏展开。

宋夏边境“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3],对北宋而言,防守起来非常困难。建立大量的堡寨,是北宋西北边防的一大特色。北宋的堡寨多是随河流走向布设,又沿宋夏边境(极边地区)呈带状分布。文献记载也多可加以证明:“安定堡,地名马蹄川,控清涧川一带……青化砦,太平兴国中筑,号青化堡……西控青化川口……永平砦,东控永平川……招安砦,北接杏子河……新砦,控延川东北疆远川一带……金明砦,控金明一川之口。”^[4]其中所记堡寨,均控扼川口要地。平时,堡寨可在后勤补给方面发挥屯田、护耕和疏通粮道等作用。战时“这些堡寨实际就是关隘,扼守着西夏向东南进攻的要道”^[5]。

史念海先生的论断不无道理。北宋政府的这种军事布防,是与宋夏交界地区的地理和交通情况息息相关的。据韩茂莉考证,陕北和陇东地区为宋夏的主要战场,“宋夏两国交界地带的地形,按其特点可分为两类。明长城沿线以北,多为风沙草滩地形……明长城沿线以南为黄土丘陵沟壑及梢林山地地形。风沙区与丘陵沟壑的阻隔,使河谷成为宋夏两国间的自然通道,‘兵行需由大川’”^[6]北宋陕西路即地处黄土高原地区,其地形被渭河、泾河、洛河等呈南北流向的河流冲刷地支离破碎,交通道路多沿南北走向的河谷展开。西夏也多循河谷入侵宋境,如镇原路的葫芦水谷地,由黄河南岸一直通到六盘山下,西夏骑兵经常由此入侵。这使宋军不得不沿河布防,将大量兵力集结在河谷地带。仁宗庆历年间设置的泾源、仪渭、鄜延、秦凤四个安抚使路,其辖区往往是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地区,我们亦可很明显地看出其中的山川形便理念。而据程龙考证,宋军后勤补给中的运粮与就粮也大多沿河谷进行,并在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建立固定的对应关系。陕西沿边四路,麟府路及鄜延路,泾源、秦凤与熙河路均是如此^[7]。

与堡寨的设置相应,北宋军队的部署也基本是以河流道路的走向为基础的。北宋所筑堡寨规模一般较小,“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8]其所能容纳的驻军数量也自然有限,除个别大寨之外,通常只有三五百人。但其数量众多,据记载:“秦凤、鄜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祐之间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元丰二百七十有四。熙宁较于嘉祐为一倍,元丰较于嘉祐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9]仁宗庆历之前,北宋在西北的禁军据说已达三十万之众,但帅臣仍频频“以部队鲜少为言”^{[10]1144},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及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士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10]3600}即庆历之前,宋军的禁军多集中于宋夏边境的堡寨,而帅臣所居之近里州军兵力较少。这种部署在抵御李继迁的骚扰时尚可御敌于国门之外,但面对元昊深入宋境、以众击寡的策略时便暴露出了兵力分散的弱点,同时,也造成了后勤补给上的长期紧张。

经历了三次大的惨败之后,宋廷不得不改变布防形势。即逐步以弓箭手代替禁军戍守堡寨,而将

禁军回撤到近里州军,以防备西夏军队的深入。具体为:“三分东兵,以一屯边,以助土兵之势;以一徙次边,或屯关辅,以息馈饷之劳;以一归京师,以严禁卫之势。”^{[10]3599}至英宗治平年间,土兵基本上代替了禁军戍守寨堡。而禁兵则“却搬东兵近里城寨把守”^[11]。

《宋史·兵志》记载的“建隆以来之制”,即为神宗之前北宋的兵力部署。王曾瑜曾利用这些数据,列表分析了其禁兵分驻情况。针对西夏的部分大致是^[12]:河东路的麟、府二州,共设5指挥。陕西路共设禁军329指挥,其中,永兴军23指挥,河中府12指挥,同州11指挥,延州21指挥,鄜州13指挥,庆州11指挥,宁州12指挥,秦州34指挥,陇州16指挥,渭州21指挥,泾州18指挥,镇戎军16指挥。其他州军驻军或一或五指挥不等。如以满额计算,则陕西路及河东麟、府二州共有禁军十六万余人。从上边我们也可看出,北宋的禁兵出现了较为集中的现象。永兴军、延州、秦州、陇州、渭州、泾州、镇戎军等近里州军都集中有20指挥左右的禁兵用于机动作战。骑兵主要分布在庆州、环州、秦州、渭州、原州及镇戎军等近里州军,这里地形宽广坦阔,利于骑兵实施冲击和机动作战。

此时,北宋的纵深防御体系基本上已经成型,这是一个弹性防御体系^[13],防范西夏进攻时可以堡寨为前沿防御阵地,近里州军禁兵主力与之决战,并以机动部队依托堡寨困敌归路;而在神宗至徽宗朝改变策略,对西夏进行主动进攻的阶段,亦是极以堡寨为基地,从近里州军出兵攻击夏朝境内。

二、明代:以边墙为依托的线性防御

明朝建立之初,虽然元朝势力被逐回蒙古高原,但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元人北归,屡谋兴复”^{[14]2235},明朝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边防压力。正如清人谷应泰所分析概括的:

顺帝北出渔阳……元亡而实未始亡耳……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假令蹄林祭纛,大举复仇,田单一鼓而下齐,申胥七日而救楚,岂得云情归之气,没世不复歟!^[15]

正因如此,从明太祖开始,就着手在从辽东到甘肃的漫长北部边疆设置众多都司、卫所,布置重兵。黄河上游地区所在的陕西都司与陕西行都司是明朝掌控西北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正所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则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16]

另一方面,明代黄河上游地区西接哈密、赤金蒙古等关外七卫,南控西番十三部,北御蒙古各部,属于三面用兵之地,其“界在羌番、回虏之间,非他镇内连省复而一面邻边之比,尤难为守”。^[17]为了达到“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18]的战略目的,明政府在黄河上游地区建设了南北两条防线,陈设重兵,修建了由行都司城—卫所城—堡寨构成的军事城镇体系,并依托边墙,对河湟地区以藏族为主的各部族,和内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进行经略和防御。

1.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防线与河湟地区西番各部族。河湟地区地处汉藏交界区域,民族众多且分布错综复杂,据《明史·西域传》记载:“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间者,为中国患尤剧”^{[14]8539}。”由西宁、河州、洮州和岷州构成的军事体系,是明代控制黄河上游藏区的主要防线,由于明代采取较为保守的边境战略,对边境地区以防御为主,各主要军事据点,主要职能是扼守黄河及其各支流在青藏高原北部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上切割出的陡峭峡谷和串珠状河谷盆地。四个卫城在空间上呈一道西北走向的弧形,在每个卫的辖区内,由于卫城距离边境相对较近,其军事堡寨大都沿边呈横向分布,而沟通各边堡之间的道路,也呈横向平行排列,一个边堡主要与自己横向排列的城堡通过驿路来联结,而与其他横列的堡寨少有道路沟通。这种分布格局,一方面是由黄河上游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另一方面就是明代后期修筑起来的边墙的制约。由于边墙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防御体系,要依赖边堡驻军以接应。正如嘉靖年间主持修筑宣大边墙的总督翁万达所指出的:“(嘉靖)二十五年,总督翁万达集都御史詹荣、总兵周尚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

出哨。”^[19]沿边的堡寨既然是为保障边墙的防御而设置,就不可能离开边墙太远,而正是沿边墙相对均匀设置的要求决定了明代黄河上游堡寨横向分布的格局。

2. 宁夏、固原、甘肃三镇的军事布防。蒙古各部的侵扰,构成有明一代自始至终的重大边患,早在明太祖时期,就着手建立了一条东起辽东,经大宁、开平、东胜,西至嘉峪关乃至关外七卫的绵延万里,横亘整个北疆的对元防线,史称:“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20]

洪武五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遣大将徐达、李文忠、冯胜等率师三路征讨王保保,希望借此一举解决北元余患,但事与愿违。此役之后,明太祖的对蒙战略曾一度转为消极防御,直至洪武九年,明朝才再次经略西北边境地区,确立了对河西走廊的稳固控制。为了保障黄河上游地区的安全,明朝在此地设置了众多都司卫所,分别由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管辖,形成了都司(行都司)一卫(守御千户所)一所的统军体制。

洪武三年至九年,先后设立了兰州、庄浪、宁夏和凉州四卫。洪武十七年至三十年十几年内又陆续设置了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六卫、宁夏四卫、肃州卫等。河西地区的卫所设置远远超过了宁夏与兰州等地。明代初期,都司卫所仍是军队的主要组织方式,卫所数目的多寡代表了军队数量的多少和政府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河西地区楔入西北,地处“羌戎”之间,军事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明代初期,朝廷在河套之外设置了东胜、云川、玉林、镇虏等卫所,对河套地区进行了比较稳固的管理。“国初,尝守之,兵民耕牧套中。自东胜而外,地平衍,虏来,一骑不能隐,以故避不入。”^[21]宁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第二道防线,所以只固守宁夏卫城和灵州城两个重要据点而已。

与宁夏地区不同,河西地区与蒙古部族之间并无缓冲区域,故明太祖要在洪武二十八年强调“西凉、甘、肃、山丹屡被胡虏入寇”。马顺平指出,狭长的河西走廊中,有两条大河流入茫茫荒漠,即汇合甘州、肃州平原诸水北流至亦集乃海子的额济纳河,与汇集凉州平原水系东北流到白亭海的三岔河(石羊河),它们是蒙古高原和西套贺兰山一带的蒙古部众侵扰河西的天然通道^[22]。事实上,由河西走廊北流入戈壁地区的河流并不止此两条。这些河流主要呈南北的纵向排列,陕西行都司徒置甘州和肃藩建立后,遏制蒙古骑兵沿这些内陆河入侵成为当务之急,遂陆续置威虏卫、白城子千户所、威远千户所、镇夷守御千户所、镇番卫等要塞防护。为了扼守这些河谷地带,陕西行都司所辖卫所就势必要沿边界呈横向联结。

自正统年间开始,不断有蒙古部落进驻河套地区,成化朝以后,河套地区已经成为蒙古各部的永久性驻牧地,并时常南下侵扰宁夏、甘肃、延绥等地区,几乎无年无患^[23]。宁夏的花马池、兴武营和灵州一带因为地势平缓,最常受到攻击,明朝廷认识到“套虏”的威胁,开始着手在黄河上游地区建立新的防御体系,“若择花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设参游,移总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兴武等营,令三百里之间,旌旗相望,刁斗相闻。”^[24]¹⁰²

而进入明代中期,军事指挥系统由都司卫所制转变为镇戍制,军事的战守由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镇戍军官来负责,镇戍制机构大量设立,其驻地分布也十分广泛。此一阶段,在宁夏镇城设置了总兵把守,花马池营城设置了东路右参将,灵州所城设置了中路左参将,平虏营城设置了北路分守参将,邵刚堡设置了南路分守守备,宁夏中卫城设置了西路左参将,兴武营设置了东路协同,广武营设置了西路协同,清水营设置了游击将军。

可见,到了明代中后期,宁夏地区已是密布军事城镇,其沿边的主要区域,都已设置可以独当一面的镇戍军官组织战守,形成了一个三面防守,以西、东两边为主的防线。从而改变了明初只依托少数城镇组织战守的局面。这条防线其东,是为防御“套虏”的侵扰;其西,则是防御贺兰山后的蒙古部族,“贺兰山后乃虏贼巢穴,累次寇边,皆自此而入。”^[25]而这东西二线,与成化年间徐廷璋、范瑾及贾俊所主持修筑的明长城相互依托,共同组成了宁夏地区的对蒙防线。

河西的甘肃镇由于在明代初期就建立起了众多都司卫所的城镇,虽然在明中期以后设置了众多的镇戍军官,也陆续新建了数量众多的镇戍营堡,但其都司卫所城依旧是防御体系的骨干,其沿边排列的横向分布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只是控制据点的分布更加密集。同样,防御蒙古的其他军事城镇、堡寨,如镇羌营、庄浪卫,受长城制约,均沿边墙呈横向排列,彼此之间的道路也是横向的。相应的,周边驿站的排列分布,如岔口驿、武胜驿、南大通驿、红城子驿等,均顺边墙设置,规律与河湟地区一样。新边之内虽然以“大松山堡守备领之”,但芦塘营、三眼井、红水营等均沿新边而布。

三、清代:驻兵于枢纽之地

清朝对清代黄河上游地区的军事布防,主要集中于甘肃、青海两个省份。对于清廷而言,两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控制南部藏区和北部、西北部蒙古的关键地区。甘肃“东接邠岐,南控巴蜀,西抵羌戎,北接流沙……山川雄壮,边屯垦辟,为新疆之孔道,实天府之要区”。^[26]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甘肃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清代时期的西北战事中,就是以重臣坐镇肃州,作为战争指挥的枢纽。青海“外倚新疆,内连本部,蒙古襟其左,西藏控其右,实居我大中华之中心点。行似秋叶,有高屋建瓴之势”^[27],是清廷控制西藏、新疆的前沿与通道。

直到雍正前期,青海都为和硕特蒙古占据,并未归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故甘肃对于清廷来说,地位尤其重要。因此,在清前期不断加强甘肃的布防。但当时由于西北面形势较为缓和,而南面却战斗正炽,故清廷对河西走廊部分的兵力有所裁撤。如为了镇压农民起义,顺治三年,征调甘肃镇壮健马步兵4500名,“甘城愈加空虚,目今海彝不时出犯,贼犯在在截抢,见在兵马尽皆赤贫,遇警何裨缓急,防御机宜实难凑手”。^[28]对河西走廊南部地区的防护有所加强,尤其是与当时青海交界的地区。顺治十三年(1656),清朝政府移临巩镇总兵官驻西宁,并升西宁副将为西宁镇总兵。包括洮、岷、临、兰、巩、秦等16营在内,西宁镇共统绿营兵12425人。这一部署在此后的康熙十三年(1674),西宁总兵王进宝击败吴三桂和平凉王辅臣的南北夹击,克复临洮、兰州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战略优势,这使清政府更加重视此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

在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统一青海。面对如何控制西藏和平定新疆的新局面,清廷根据其《边防事宜八条》和《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对青海、甘肃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布防进行了新的调整。相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奏称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也。查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

一、奏称陕西边防宜严界限也……请于西宁之北川边外上下白塔之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地方,创修边墙,筑建城堡……悉成内地。又肃州之西桃、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处,俱膏腴之地,应令民人耕种……至宁夏险地,无过于贺兰山……山前营盘水、长流水等处,俱为内地。均应如所请。

一、奏称甘州等处宜添设官弁也。查甘州、西宁、疆界相连,应于此二处设立营汛……于新设边内大通河,设立总兵一员,兵三千名,管辖中左右三营;于大通南边,设立参将一员,兵八百名;大通北边,设立游击一员,兵八百名。盐池地方,设立副将一员,及左右都司二营,兵一千六百名……至西宁地方,宜改设同知,移西宁通判、驻劄盐池,令其办理税务。再河州保安堡,应设游击一员,千把总各一员,兵四百名。归德堡,应添设把总一员,兵二百名,俱隶西宁总兵道员管辖……均应如所请。

一、奏称打箭炉等处亦宜添设官弁也……黄河两边渡口,应设守备一员、兵三百名,悉隶松潘总兵统辖。里塘添设同知一员,令其管理兵粮,收纳番民贡赋,则南至滇省,北至陕省,俱可援助。均应如所请。

一、奏称边地弁兵宜归并裁汰也。查西宁地方,设立总兵,留兵四千,即可敷用,应裁五百名,归并于大通镇,属甘、凉、庄浪等处其余营汛兵丁,可裁一千名。宁夏既添驻满兵,其绿旗兵丁,亦可裁汰一千,改为四营,将后营游守千把等员,补入大通镇……均应如所请。^{[29]330-336}

清廷新的军事布防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在对青海划分盟旗分而治之的基础上,从西宁北川经扁都口至甘州六百来里的地区修筑边墙,不许他们过界放牧,以隔绝蒙古与吐蕃的联系,并加强对此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内地,强行加固中央对此地的控制。其次,增设营镇,加强核心区域的镇守。针对和硕特重点攻击的西宁、和州、布隆吉尔等地区,雍正二年,清廷在布隆吉尔增设总兵一员,又于大通河设总兵,统兵三千镇守,并于河南设参将,统兵八百,河北设游击,统兵八百,盐池设副将,统兵一千六百。河州所属归德、保安二堡,地当小河曲,是拒蒙古,护藏人的要冲。故于保安堡添设一游击,兵四百,归德添设一把总,兵二百五十名,并将二堡官兵改归西宁县镇道管辖,以便呼应。再次,归并裁撤部分驻军。如宁夏裁汰一千绿营入大通镇。

从上述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对黄河上游地区的布防,在地域上有逐步集中的趋势,西宁地区即是典型的一个案例,将周边地区的防务均置于其管辖之下,其原因不外乎其控制了蒙藏交通的要冲。而我们在打箭炉、凉州、甘州、肃州等地也同样发现了这种情况。而几乎与此同时,青海、甘肃等地内地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快。如雍正二年年尾即有诏谕:“西宁厅请改为西宁府,所属西宁卫改为西宁县,碾伯所改为碾伯县。西宁通判专管盐池,即为西宁盐捕通判。西宁之北川,应设一卫为大通卫,俱隶西宁府管辖。”^{[29]396-397}通过城镇建置的变化及城镇功能行政化的转换,来直接推行内地的统治方式,也使得青海、甘肃地区与内地的政治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加强了清廷对青海地区和各族民众的直接控制。《善后事宜》中的相关经济控制措施也有很多,相关论著也有不少,在此就不再详述。“清廷加强对青海的统治后,不仅限制了准噶尔联络青海蒙古的活动,也限制了准噶尔与西藏反清势力的联系,同时,消除了青海蒙古对河西通道的威胁。这些问题的解决,为乾隆朝一举平定准部,统一新疆准备了条件。实行善后措施,加强对原和硕特控制的以青海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统治,对清廷逐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30]

这一内地化的趋势,最终使得甘肃青海等黄河上游地区逐渐变成了清廷对西北准噶尔用兵的后勤基地。而至乾隆年间,这一地区的军事布防变得更为集中化。

经刘景纯考证:“顺治、康熙时期对前明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单纯卫、所城镇的调整仅限于量的归并、裁减或等级的降低,实质性的改变不大。雍正时期的卫、所改制,从本质上基本结束了旧的边防军事城镇格局,主要的单纯卫、所城镇为行政中心城镇所取代。”^[31]许多继承自明朝的军事城堡,或行政化,或被裁撤,这是承平日久的必然现象。但与此同时,清代黄土高原地区“旧边”及其沿边地带的裁废并不突出,至少从前中期的史实看是这样的。如西偏的西宁府,未见有明显的减废,反而增加了十几个。如甘肃大通卫虽然已经改为大通县,呈现了和平时期的特点,但是镇海堡、西大通堡等均为后来所增加的部分。可见,军事布防逐步集中于核心地区的边防重镇。而通过西宁、凉州、甘州、肃州等重点军镇的集中驻军来看,恰恰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通往新疆的重要通路。

四、结 语

宋、明、清三朝对黄河上游藏、羌、蒙等番地的军事布防,根据其与各蕃部的力量对比、双方交界的地形特征以及历史形势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北宋初期失去灵、夏等州之后,使得其南边的瀚海和横山成为宋夏之间的天然分界,同时也成为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难以逾越的屏障。西夏骑兵则较为容易突破这一地区的限制,并利用边境河谷纵横的地形不断侵扰北宋边境,甚至深入陕西路进行劫掠。这也迫使北宋沿着河流的走向建置大量的堡垒,从而逐步形成以堡垒为前沿防御阵地,近里州军禁军主力机动决战的纵深防御体系。明朝在黄河上游控制的地区较北宋有所拓展,河西地区楔入西北,对南边的藏区和北方的蒙古势力的防御均以边墙为依托,建立起了一南一北两条线性防御体系,以实现隔绝羌虏的目的。明朝中期之后,宁夏地区的镇戍机构的设置,也和边墙的走向相结合,形成东西两条最主要的防线。清朝所控制的西北疆域较宋、明要大的多,对黄河上游地区进行的内地化

趋势较为顺利,故多以精锐军力集中屯驻于枢纽之地,以掌控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交通要道为主。

有观点指出,唐代以后,中国古代各王朝的政治重心和边患问题有从西北向东北转移的趋势。唐朝即开始在洛阳建立东都,五代北宋时将都城东移到了开封,元明清时期都城又东北移至北京。五代曾有两个王朝被自东北兴起的契丹灭亡,北宋徽、钦二帝也是被崛起于东北平原的金朝俘虏而去,明朝同样是被建州女真取而代之。但是,被北宋君臣认为是“一方小警”的西夏,与北宋的战争先后持续了一百余年,几与北宋王朝相始终。而东北的契丹,自澶渊之盟后,与北宋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局面。明朝黄河上游地区蒙古势力的侵扰也同样严重,“成化以前,虏患多在河西,自虏居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间更为敌冲”。^[24]¹⁰²以至于明朝中期之后仍不断在河东、河西地区布置重兵,建置堡垒,修筑边疆。清代在西北先后平定准噶尔、青海和硕特蒙古、回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从康熙朝一直延续到乾隆朝,均以黄河上游地区为枢纽之地展开。可见,从黄河上游地区的军事布防情况来看,西北边患仍是真正长期牵扯中原王朝国力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 半一之. 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7.
- [2] 郑宝喜. 甘肃省经济地理[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9-19.
- [3]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1722.
- [4] 曾公亮. 武经总要·前集[M]//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 中国兵书集成.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881-882.
- [5] 史念海. 河山集[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49.
- [6] 韩茂莉. 宋夏交通道路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1):141-152.
- [7] 程龙. 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8.
- [8] 脱脱. 宋史·徐禧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723.
- [9] 曾巩. 元丰类稿[M]//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宋集珍本丛刊:第10册. 北京:线装书局,2004:415.
- [10]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1]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兵五之六.
- [12] 王曾瑜. 宋朝兵制初探[M]. 北京:中华书局,1983:45-49.
- [13] 曾瑞龙. 拓边西北[M]. 香港:中华书局,2006:45-78.
- [14]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5]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49.
- [16]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陕西方輿纪要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05:2449-2451.
- [17] 杨春茂. 顺治重刊甘镇志·兵防志[M]. 张志纯,校点.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362.
- [18] 张天复. 皇輿考[M]//宛谿堂丛书:第7册.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167.
- [19] 觉罗石麟. 山西通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6:9-10.
- [20] 魏焕. 皇明九边考[M]//中华文史丛书:第15册. 台湾:华文书局,1990:27.
- [21] 茅元仪. 武备志[M]//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26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520.
- [22] 马顺平. 明代陕西行都司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2009:32.
- [23] 李国祥,杨昶. 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M].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870-1059.
- [24] 许论. 九边图论·宁夏[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1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25] 毛纪. 明孝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408.
- [26] 穆彰阿. 嘉庆大清一统志[M]. 影印版. 上海:上海书店,1984.
- [27] 汪公亮. 西北地理[M]. 台北:正中书局,1940:382.
- [28] 张伟仁. 明清档案[M]. 影印版.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
- [29] 清代官修.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0] 王希隆. 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J]. 西藏研究,1992(12):27-37.
- [31] 刘景纯. 清前中期黄土高原地区沿边军事城镇及其功能的变迁[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2):78-85.